

# 无情天地内 多情有杭商

## ——明清小说中杭州商人的情感世界

朱永香<sup>①</sup>

(浙江林学院, 杭州 311300)

**摘要:** 明清小说塑造了众多杭州商人的形象, 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 一城山色半城湖”, 山的坚定与水的柔情完美融合的秀丽景观不仅影响了杭州商人的生活方式、经商习惯, 也使他们的情感和婚姻体现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多情、重情、依恋故土。

**关键词:** 明清小说; 杭州商人; 情感世界

### Merciless Is the World, Amorous Are Hangzhou Merchants

——Emotional World of Hangzhou Merchants in Ming and Qing Fictions

ZHOU Yongxiang

(Zhejiang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Abstract** Images of Hangzhou merchants are created in the fic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irmness of mountains and the tenderness of water of beautiful Hangzhou, "a mountainous city whose three sides are surround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whose one half is embraced by a lake", influence not only Hangzhou merchants' lifestyle and their way of doing business, but also their emotions and marriages, making them sentimental, amorous, and nostalgic, an emotion full of local character.

**Key words** fictions creat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ngzhou merchants; emotional world

明清时期(本文的明清时期指 1368 年至 1840 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日趋活跃。商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其特定的以追逐利益为终极目标的思维惯式和经年奔波劳碌的生活方式,其情感生活也显示了群体共性,比如重利轻别离,用金钱追欢买笑,成为娼楼妓馆的常客,等等。而在这种群体共性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地域的差异性。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sup>[1]</sup>在众多描写商人的小说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了商人的性格特点、经营方式,也影响了商人的

情感倾向及婚姻生活。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山的坚定与水的柔情完美融合的秀丽景观不仅造就了历代杭州人和谐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悠远绵长的历史文化,也使明清小说中众多的杭州商人的情感婚姻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作为商人婚姻生活的另一重要主角,杭州商妇们不仅同样有着丰富的内心情感,也显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

#### 一 爱情至上、依恋本土的杭州商贾

##### (一) 多情且重情的商人

商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多数以负面形象出现,这不仅是因为历来统治阶级重农抑商政策致使商人一直居于末位的社会地位的影响,还因为商人本身

① 收稿日期: 2009-08-20

基金项目: 杭州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清小说中的杭州商人研究”(C08WX06)

作者简介: 朱永香(1977-),女,湖南湘潭人,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惟利是求、信奉金钱万能等寡情少义的价值观念不符合传统道德标准。文学作品中商人的情感更是染上了浓烈的铜臭气息,他们大多认为只要舍得花银子,便无物不可买,无事不可办,无路不可通。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中的徽商程朝奉看中了卖酒的李方哥妻子陈氏,那陈氏正正气气,一时勾搭不上,程朝奉发狠道:“天下的事,惟有利动人心,这家子是贫难之人,我拼舍着一注财,怕不上我的钩?私下钻求,不如明买。”<sup>[2]</sup><sup>426</sup>圣洁的爱情在程朝奉眼内,亦不过是用钱可买的物事而已。而明清小说中的杭州商人形象,却颇多爱情至上、执着专一的重情者。

如《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主人公临安城清波门外卖油郎秦重,对名动京师、色艺双全的花魁娘子莘瑶琴一见钟情。本钱只有3两银子的秦重,为了凑齐会花魁娘子所需要的10两银子,千思万想,终于想出一个计策来,“从明日为始,逐日将本钱扣出,余下的积趸上去。一日积得1分,一年也有3两6钱之数。只消3年,这事便成了。若一日积得2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一年也差不多了。”用了一年半时间辛苦卖油、省吃俭用,“只拣足色细丝,或积3分,或积2分,再少也积下1分。凑得几钱,又打做大块头。”日积月累,攒下了16两之数。当秦重费尽心机,终于如愿,却碰上瑶琴烂醉如泥自外归来,不仅不曾受到招接,反而一会儿用自己刚买来的绸缎衣服接下瑶琴的呕吐腌臢之物,一会儿斟浓茶为其漱口,整整忙了一夜。秦重非但没有半点埋怨,反而因为可以一亲美人芳泽而欣慰。瑶琴被贵家公子脱掉裹脚扔在外面无法回家,正好碰上秦重路过,秦重不仅将自己随身带的白綾汗巾为其裹脚,温言劝慰,而且雇了一顶软轿,自己步行,送瑶琴回家。其厚重执着的爱情终于感动得瑶琴发出“我要嫁你”,秦重如愿抱得美人归。<sup>[3]</sup>秦重追求瑶琴的这种努力,近似于一种艰苦朝圣的“天路历程”,只不过这不是宗教性质的“天路历程”,而是情感性质的“天路历程”。虽然他所追求的对象瑶琴为娼门之女,但秦重显然有别于其他卖笑追欢的商人狎客。他从一开始就付出了真情,并坚忍执着地不惜为爱情付出任何努力,难怪作者给他取名秦重了,秦重,情重也。

又如《济公全传》第157回中的主人公王太和,石杭县(今杭州)人,自幼父母给定下前庄韩员外之女为婚。后来一个道士给他相面,说“看阁下的相貌……有财而无库,你是一世不能存财。峨蛇文入

口,将来必主于饿死,你7岁丧父,9岁丧母,16岁犯驿马星。这几年在外面奔忙劳碌,幸喜你还勤俭,也没落下什么,从此之后,你是一天不如一天。尊家的相貌,贫道也就不能往下再说了。”王太和一听老道所说之话,已过之事,果然一点不错,大概未来之事,也必有准。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命运,自然是万分沮丧。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却是退亲:“我终归饿死,我还往前奔什么?莫如我赶紧回家,把亲事退了,叫我岳父给姑娘另找婆家。我是这个命,别连累人家。”去韩员外家退亲时才知道,自己聘定的未婚妻眼瞎了。“王太和一听姑娘已把眼瞎了,自己一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该当要讨饭,我前头走,拉着一个瞎子,这倒也不错。’”<sup>[4]</sup>王太和没有任何犹豫,将眼瞎的未婚妻娶进了家门。没想到成亲没几天,王太和就得了一注意外之财,从此陡然大富,有三百多万银子,在本地开银楼缎号,置买田地房产。豪富之后,王太和依然和自己眼瞎的结发妻子白头偕老,既无任何嫌弃之意,也无娶妾之说。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女性商人形象,同样体现了其重情执着的情感特质。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中临安西湖旁卖酒女子与江西一个官人两情相悦,因父母不允而未能谐合。5年后,官人重至西湖,道遇女子,并谐鱼水之欢,共居半年。原来女子因相思太过,早已身亡,只为酬报官人夙世缘契,所以一直幽魂未散,多情如此,以至作者凌濛初都忍不住慨叹“可见情之所钟,虽已为鬼,犹然眷恋如此。况别后之病,又能留方服药医好,真多情之鬼也!”<sup>[2]</sup><sup>438</sup>

## (二)重利重别离的行商

商人往往为求利而轻别离,而他们长期离家在外的流动性生活而导致的性饥渴,再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成为产生婚外情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是娼楼妓馆的常客,甚至还出现了符合他们特定生活方式的“两头大”的异地重婚现象,即在家乡娶一房妻室,承担奉养双亲、操持家务、稳定家庭等重要责任;为了满足因常年在外,无法与妻子相聚而导致的生理需求及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在主要经商之地又另外建立一个家庭,这另外一个家庭的女主人的身份其实仍然是妾,不过由于不和正妻住在一起而享有较多的自由,所以当时称之为“两头大”。在一夫多妻制度的保护下,这种现象在古代是极为普遍的。杭州行商们也不乏娶妾者。但是,他们更愿意将从外面娶到的妾带回家中,与正妻共同生活,而不是选择如徽商等的“两头大”的婚姻方

式。如《错认尸》(《清平堂话本》)中主人公乔俊,杭州城众安桥北首观音庵人,祖籍钱塘人。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卖了,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一年有半年不在家。乔俊从东京卖丝回来路上遇一美妇人春香,慕其色,纳为妾娶回家中,“也行了五七日,早到此新关歇船上岸,叫一乘轿子抬了春香,自随着,径入武林门里,来到自家门首”。

有些杭州行商在外经商多年,也不愿背叛家中妻子,不在外面娶妾。如《世德堂连双并秀》(《二刻醒世恒言》)中的临安府临安县人周尚质,因家计艰难,“收拾些衣饰,变卖做本……去到山西,做些毡货生理”,后因收了假银,连本都折了,幸遇一同乡搭救提携,居然又做了官,几年之后依然回家与妻子家人团聚。

## 二 有情商也有智商的杭州商妇

文学作品塑造了很多商妇形象,大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因丈夫长期经商在外,无法忍受“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寂寞与痛苦,<sup>[5]</sup>遂或被动或主动委身于自己所喜爱的男子,一任自己偷尝红杏出墙的禁果,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女主人公三巧儿,《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山西商人沈洪的妻子皮氏;一类则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妇德,让自己成为贞节牌坊上的悲壮祭品,这类形象在各地方志及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

杭州商妇亦偶有出墙红杏,如《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生性放荡的女主人公淑珍。但是,更多的商妇形象,则不仅显示出明断果敢的商人气质,又有支撑维护家庭的贤淑美德。对于丈夫亦或自身出现的情感问题,也能够很好把握拿捏,表现出了较高的智商和情商。

如《欢喜冤家》第九回中主人公王小山的妻子方二姑,丈夫的油盐杂货店因为缺乏本钱,无法维持,“那妻子看不过,把些衣衫首饰与丈夫添补”,对丈夫生意的极力支持。杂货店终因没甚大来头生意,再加上日用支费,眼看又无法维持,丈夫想着关门,又是妻子站出来进行阻止,说“自古懒店强如健汉,货虽少,还开着是个店面。寂然关了,便被人笑话了。”王小山设了个美人局骗取邻居张二官出300两银子入伙,生意也渐渐好起来,方二姑趁机鼓励丈夫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你如今有了银子了,着实留

心置货来挣得大大的一个人家,也待你为妻的快活几年。”王小山却安于现状,想设计图谋二官的入伙银。还是二姑明断事理,“你看他两个中人都是秀才,怎么将他下这局面。他怎肯歇了。必然告起状来。难道好说出此样话来。劝你还是务本做生意,趁的银子长久。若这般骗局,恐人不容,还有天理。今年50岁了,积得个儿子接续宗枝,也是好的。”当贪心的丈夫最后想要将二官扫地出门时,依然是二姑晓之以理,“竟还他200两银子,200两银子货物,便安稳了。省得把银子用在衙门里,仍要还他本利,人又说不是。”终于免却了一场争分。小山“年纪足足50了”,而方二姑年方22岁,“生得风流出众,月貌花容”,本来是因为“京里点选秀女,一时人家有未嫁之女,只要有人承召,就送与他了,那里说起年纪大小,贫富不等”,才嫁了他。当王小山设计美人局,企图用美貌的妻子勾引22岁“为人极风流有钞”的张二官入伙,却弄假成真,终至二人情愫暗生,作者最后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sup>[6]</sup>

又如《错认尸》(《清平堂话本》)中主人公乔俊的正妻高氏,当丈夫出外行商,“一年有半年不在家”的时节,高氏安心在家,帮衬丈夫打理生意,“常管日逐进出钱钞一应事务”。好色的丈夫从外面娶回来一房,高氏虽然怨恨,并不许和妾周氏同住。但当天气寒冷,丈夫出门在外,她还是念着周氏,派仆人将些柴米、炭火、钱物送过去。当听说妾周氏与他人有奸情,为了维护丈夫的声誉,高氏不计前嫌,将周氏接回家中。其遭遇既控诉了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的屈辱,也体现了高氏为了家庭利益而甘愿委屈自己的贤淑。

## 三 地域环境对杭州商人情感取向的影响

杭州商人体现了有别于其他地域商人的浓厚的乡土观念和珍惜家庭的情感特征,与其独特的地域环境是分不开的。杭州曾是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自然风光亦独步天下:杭州地形西高东低,群山环抱,东临杭州湾,南横钱塘江,北通大运河,而西湖则像一颗明珠镶嵌在中央;既有江南山水之秀丽,更有钱塘江潮之壮观;兼之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因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昔日尊荣的帝都文化,杭州人普遍具有地域优越感,“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犴下,势使之然也。”<sup>[7]</sup>“吾杭为东南江海重藩,会区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贵,赋之重,山川清淑,人物英明,宫屋城池之壮,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sup>[8]</sup>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更使杭州成为贯穿中

国南北的大运河的终点,极大地推进了杭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五代吴越国定都杭州,吴越三代、五帝开明的统治政策也使“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今其人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sup>[9]</sup>自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置行宫于杭州,更使“杭州省会,百货所聚。”这一地域优越感和历来繁荣的商业经济使得杭州商人念念不忘富庶安定的本土,所以即使行商在外多年,甚至在外置妾,也不愿将经商地作为自己的家,出现如徽商等的“两头大”的异地婚姻模式。

不仅如此,山川秀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赋予了杭州商妇们多情的性格,而商业经济的繁荣又使得她们在承担作为妻子责任的同时,又能自然地融入商业活动,“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sup>[10]</sup>而且,杭州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币者,必走浙之东也。”<sup>[11]</sup>无论是养蚕亦或丝织品的织造,都需要有女性的参与,这也使得杭州商妇们能够更为频繁地参与家庭的商业活动,从而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再现,从明清小说中这些多情、重情、对故土和家庭无限眷恋的杭州商人形象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虽然他们同样在为生活而四处奔波,他们的爱情也同样或多或少地烙上了商人特

有的印痕,即在追求爱情时难免以金钱为基础。但是,在当时相对富庶、安定、和谐的杭州,这些商人的情感世界却能够相对保持着一角净土,彰显着爱情独有的光辉。

#### 参考文献:

- [1]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4 年言 2
- [2]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长沙:岳麓书社, 1993
- [3]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41.
- [4] 郭小亭. 济公全传[M].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463
- [5] 白居易诗选·琵琶引[M]. 谢思炜, 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108
- [6] 西湖渔隐主人. 欢喜冤家[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97- 110
- [7] 周密. 武林旧事[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 351.
- [8] 成化. 杭州府志:卷首夏时正序[M]. 济南:齐鲁书社, 1996
- [9] 欧阳修集·有美堂记[M]. 刘扬忠, 编选.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171
- [10] 王士性.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106
- [11] 张瀚. 《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M]. 盛冬铃,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83

责任编辑:黄声波